

官僚「再詮釋」領導人意識形態： 以《人民日報》習近平外交思想的評論 為例*

蔡 儀 儂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廖 彥 傑

（伯明翰大學政府人工智慧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意識形態在維繫中共政權穩定，扮演重要角色。部分研究分析官方制定意識形態的過程，指出意識形態建構實非鐵板一塊，意識形態在完成後，官僚組織也會「再詮釋」意識形態陳述。不過，類似研究較少觸及意識型態涉及外交領域，官僚組織是否會進行詮釋。領導人的冠名意識形態，是否又影響外交政策的陳述。本文以《人民日報》討論冠名意識形態：「習近平外交思想」報刊評論為例，借鑑中共黨報「寫作組」概念，檢視上述議題。在研究策略，我們先在資料蒐集過程根據評論作者，標記其所屬官僚組織，再結合自動文本摘要（Automated Text Summarization）與空間點估計（ideal point estimation）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Poisson Scaling Model）進行分析。模型顯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報刊評論，由於作者所屬官僚組織的不同，陳述立場的空間分布呈現差異。這呼應官僚組織確實有透過意識型態的差異性敘事，標示其立場傾向的見解。

關鍵詞：意識形態、量化文本分析、空間點估計、習近平外交思想、人民日報

註*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習近平特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世界觀與公共治理」研討會，作者誠摯感謝評論人吳文欽教授，與會先進寇健文教授、鍾延麟教授、宋國誠教授的評論與建議。三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的寶貴指正與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惟本文所有文責，悉由作者自負。如需本文原始文檔及 R 語言編碼，請洽通訊作者網站：<https://github.com/inung0327>。

* * *

壹、前言

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治體系有重要地位，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幫助領導人建立統治正當性，黨以此進行組織、思想與宣傳工作，引導官僚與群眾服從黨的政策指示（李英明，2003，2011，2017；陳璋津，1988，1995；張執中，2018；趙建民、張執中，2005；楊繼繩，2004；Gao, 2019；Lieberthal, 1995；Schurmann, 1968；Wu, 2015）。但意識形態在一些政策領域的影響力，如外交領域，是一個較少討論的議題。早期的中共外交，意識型態曾有相當重要性（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Meisner, 1999）。^①但 1980 年代後，中方開始在國際場合，避免過度使用意識形態論述，以與國際社會接軌，意識形態在外交領域的影響力日趨淡化。（Brady, 2008; Lampton, 2014; Lieberthal, 1995; Shirk, 2007）。^②

就此，2018 年中共官方公布第一個以領導人冠名的外交工作指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根據官方解釋，「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現行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民間慣稱「習近平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外交工作」的緊密結合（新華網，2018；錢洪山，2022）。^③多種跡象顯示，習近平主政後，意識形態部門介

註① 這類案例可見吳冷西（1999）關於 1960 年代中蘇意識型態論戰（史稱「九評蘇共」）的回憶。

註② 一些有外交工作經驗的學者如藍普頓（David M. Lampton）、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謝淑麗（Susan L. Shirk）等都有類似觀察，他們認為意識形態影響力在中共外交決策逐漸淡化（Lampton, 2014; Lieberthal, 1995; Shirk, 2007）。美國總統拜登時期的國家安全會議中國及臺灣事務資深副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著作則提供不同的觀點。他分析官方意識形態文件與宣傳機構的出版品，指出這類資料顯示 1980 年代後中共對外交與國防政策，規劃了一個中美博弈的長期戰略藍圖（Doshi, 2021）。

註③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共十九大通過的新的官方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而「習近平外交思想」明確納入「習近平思想」，最早見於 2018 年 6 月 22 至 23 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公報，這次會議確立「習近平外交思想」在外事工作的指導思想地位。時任中共外事工作最高負責人楊潔篪，在本次會議總結講話指出：「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在外交領域的重大理論成果，是新時代我國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雙引號為作者所加）（新華網，2018）。此次會議公報後連同習近平本次會議講話，於官方媒體《人民網》、《新華網》等公告，並刊印於官方出版「習近平思想」有關著作。

入外交工作的頻率日趨頻繁（Chen, 2022; Chen and Hsu, 2018, 2021; Hu, 2019; Tsai, 2017; Tsang and Cheung, 2024）。「習近平外交思想」陳述，則廣泛出現在外交政策文件、中方媒體的外交報導與評論、外交官僚在國際場合的發言等。鑑於在中共歷史上，領導人冠名意識形態於外交領域的使用，非常罕見。過去更未有將領導人的外交論述，提升至冠名意識型態層次。^④重探意識型態涉及中共外交領域的議題，就有學理與現實意義。^⑤

本文以《人民日報》「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署名評論」為研究對象，關注冠名意識形態涉入外交領域後，對外交論述產生的影響。^⑥這個問題具體涉及了，涉外官僚組織在冠名意識形態「習近平外交思想」公布後，對其「再詮釋」的過程。本文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影響外交政策論述的政策過程，與一般官方意識形態產出的過程並無不同。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產出，長期是高層政治折衝的產物，意識形態的書寫工作，由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層官僚負責（吳冷西，1999；楊繼繩，2004；Gao, 2019；MacFarquhar, 1997；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Patapan and Wang, 2018）。我們認為，制定「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有關官僚組織，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書寫，會使用各自習慣的語詞，融入組織關注的議題，並「詮釋」成符合其組織立場的陳述，這反映官僚組織的陳述慣性。

註④ 在中共黨史上，擁有冠名意識形態「特權」領導人原本只有毛澤東、鄧小平兩位（即寫入中共黨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而1997年鄧小平過世後，中共更無領導人擁有冠名意識形態特權。這使「習近平思想」2017年中共十九大寫入黨章時，被視為破壞黨史慣例，更使他成為毛澤東後第二位「在世」時將冠名意識形態寫入黨章的領導人。習近平這些作為，在海外學界與傳媒因此被廣泛討論（吳玉山等人，2022；李英明，2003，2017）。

註⑤ 作者感謝一位審查人指出冠名意識形態是否等同於領導人個人「想法」、「思想」的意見。本文遵循 Schurmann (1968)、Meisner (1999)、李英明 (2011, 2017) 等人解釋。他們認為冠名意識形態是用於表彰領導人功績的特權，領導人透過冠名「加冕」寫入黨史神話。雖然官方建構意識形態的過程說明，冠名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工作部門塑造的「集體性」產物。如 Meisner (1999) 認為不能將西方學界慣用的毛澤東主義 (Maoism)，等同中共黨章的「毛澤東思想」，因為1980年代後中共已將毛澤東主政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或烏托邦主義與過度意志論的思想，排除出官方意識形態書寫。李英明 (2011, 2017) 也指出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毛澤東思想」被黨史強調為第一世代「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毛澤東的個人思想、發言與文章不能全等同「毛澤東思想」。這種將領導人個人意識形態工作不斷「抽象化」，成為領導集體成果的模式，在後續意識形態的生產過程不斷複製。如「鄧小平理論」同樣被視為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智慧結晶。

註⑥ 我們挑選《人民日報》是其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在官方報刊歷史最久且發行量最大，在黨內有不可取代地位。此外，中共中央關於重大事件的表態，會通過以人民日報社論、評論員、或編輯部「寫作組」的名義發表。《人民日報》也是少數中共黨內允許不同黨政機關以機關「寫作組」與首長名義，投稿探討重要議題的輿論平臺（Tsai and Kao, 2013）。

我們觀點，借鑑 Tsai 與 Kao（2013）解讀中共官方報紙「寫作組」（官僚組織之擬人化署名）的視角，他們認為「寫作組」書寫蘊含政治符碼，領導人與官僚組織的代筆者，是以書寫的語彙與敘事的差異，進行一種表態。「寫作組」書寫，反映領導人與官僚組織潛在的表述偏好與思維慣性。我們解釋同樣呼應現存中共政策過程的理論觀察，同意碎裂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觀點的學者如藍普頓、李侃如、謝淑麗等人皆指出中共外交決策過程，普遍存在部門本位與「黨政二軌」體制引發的部門衝突等問題（Hamrin, 1992; Lampton, 2014; Lieberthal, 1992, 1995; Lieberthal and Lampton, 1992; Shirk, 2007）。《人民日報》「習近平外交思想」評論文章，由於是以三個官僚系統發表，包括：中共中央外事系統、中共中央宣傳系統及中國外交部。若三個官僚系統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書寫的語彙與敘事呈現差異，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書寫「碎裂威權主義」慣性的呈現（Chen, 2022; Lynch, 1999; Tsai and Kao, 2013; Tsai, 2017）。近期官方意識形態的「個人化」現象（即：習近平思想），又提醒我們應關注這類意識形態書寫碎裂威權主義慣性，是否因領導人因素而改變（吳玉山等人，2022; 李英明，2017; Cabestan, 2021; Mokry 2023; Hu, 2019; Tsang and Cheung, 2024）。

從方法角度，本文提供一種不同的研究策略，我們透過計量分析，系統性檢視中共外交政策關於意識形態的文本資料。現有中共外交部門官僚決策行為議題的研究，多建立在田野訪談或外交場合的觀察。^⑦本文使用官方公開文本，在資料蒐集過程，先根據評論文章作者，標記其所屬官僚組織。後續處理運用西方量化文本分析（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討論國會議員、政黨、政治團體等政治立場，發展の文本空間點估計策略（text-based ideal point estimation strategy）（Catalinac, 2017; Gentzkow et al., 2019; Grimmer and Stewart, 2013; Laver, Benoit, and Garry, 2003; Lowe, 2008; Lowe and Benoit, 2013; Proksch and Slapin, 2010; Slapin and Proksch, 2008）。文本空間點估計策略透過分析政治文本資料（如：國會議員的議場發言、政黨黨綱、選舉文宣品等）高頻率使用的關鍵詞組，透過空間點模型捕捉關鍵詞組的差異性，表現文本的立場差距。本文使用 Liao 與 Tsai（2024）應用於中文改良方法，這方法結合自動摘要生成技術（Automated Text Summmerization）與空間點估計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Poisson Scaling Model）。步驟先以 TextRank 演算法萃取文本高頻率具代表性關鍵字，再以文本資料的 Wordfish 泊松

註⑦ 如藍普頓、李侃如、謝淑麗等人。

空間模型求取行為者在單一維度的空間位置。^⑧

以下，本文章節安排，除前言外，分為五個部分，第貳節說明中共政權如何在黨報報刊發展這套意識形態書寫過程；第參節回顧碎裂威權主義解釋中共外交政策有關討論；第肆節說明資料內容、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伍節呈現主要研究發現；最後一節則為結論，摘述研究發現與可能理論意義。

貳、背景：帷幕下的意識形態書寫工程

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是領導人專擅領域，不容他人僭越。但高層周遭，長期有專門撰寫意識形態文件的智囊，協助草擬黨內會議報告、政策文件與個人著作。早期中共中央就有一批專職「秀才」——專為毛澤東和高層服務的秘書，協助構建意識形態書寫的工程（陳永發，2010；高華，2014，頁 223；鍾延麟，2014，頁 103；Gao, 2019；Schoenhals, 1992）。^⑨本文所指「寫作組」起源，即是 1960 年代基於中蘇意識形態論戰的外交情勢需要，集合「秀才」成立的專門寫作團隊。^⑩當時中共中央成立「反修文稿起草小組」，由中央書記處主管涉外關係的總書記鄧小平承擔總責，從 1963 年 9 月 6 日至 1964 年 7 月 14 日，在《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九篇批評蘇共的「公開信」，史稱「九評」（吳冷西，1999，頁 540-541，頁 637-638；鍾延麟，2013，頁 372；MacFarquhar, 1997；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Tsai and Kao, 2013）。^⑪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寫作組」開始蓬勃發展。領導整個文革群眾運動，於

註⑧ Liao 與 Tsai（2024）對應中文語言發展了一個改良 Wordfish 模型，R 語言編碼見：<https://codeocean.com/capsule/5914879/tree>。

註⑨ 這批秘書主要在中央辦公廳、中央意識形態部門任職，除服務高層草擬重要政策文件，有些秘書也負責具體工作。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等（吳冷西，1999）。

註⑩ 「寫作組」編制最早可追溯自中共延安整風時期，當時毛澤東藉改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機會，由主編陸定一與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組成寫作團隊操刀社論，以操弄輿論打擊黨內政敵。歷史學者高華認為《解放日報》的改造，助毛完成其意識形態獨尊地位，也形成中共宣傳系統長期遵循的「毛氏『新聞學』」原則（Gao, 2019, pp.398-403; Tsai and Kao, 2013）。

註⑪ 這個小組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分管外事、宣傳與情報業務）擔任組長、吳冷西任副組長。小組作業流程是寫完一個草稿後，由總書記鄧小平召集小組成員討論，根據會議建議修改或重新起草文章，再提交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審查，如有不同意見，文章會退回小組修改。最後，毛會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文章，決定是否發表（吳冷西，1999；鍾延麟，2016，頁 76-77）。

1966 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最初只是為毛澤東服務的寫作班子，但後來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能，成為中共中央的權力中心（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⑫ 1969 年中共九大後中央文革小組撤銷，服務高層的「寫作組」未消失。當時主要報刊「二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紅旗》雜誌，皆刊登署名「梁效」的文章。「梁效」為「兩校」諧音，原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是服務毛澤東、江青的寫作編制，抽調清華、北京大學教師組成（丁東，2005；周西，2010；端傳媒，2016；鄭重，2017，頁 595-644；Tsai and Kao, 2013, pp.396-398）。文革結束後許多原屬高層的「寫作組」紛紛解編，但 1980 年代後諸多中央黨政機構都學習中共中央，成立「寫作組」編制。黨政機構若要對意識形態議題表態，會以特定「寫作組」筆名在機關報刊的頭版社論或評論欄目發表意見，並以「寫作組」筆名投稿至中共中央機關版《人民日報》理論與評論版面，以擁護中央政策，或對特定議題倡議。^⑬《人民日報》內部在 1992 年後則衍生多個服務中共中央與領導人及重大議題的「寫作組」編制，用不具名表達立場。如「任仲平」是「人重評」的諧音，代表「人民日報重要評論」。這個小組被認為是《人民日報》最重要的「寫作組」，為了擁護鄧小平 1992 年「南巡」的改革開放成果成立（周西，2010；Tsai and Kao, 2013, p.399）。就此，Tsai 與 Kao（2013）分析「寫作組」歷史，使中共意識形態體系形成了一種特殊輿論機制，他使《人民日報》這類黨報刊，成為政治菁英與官僚體系進行利益表達與陳述意見的場域。

「寫作組」在報刊撰寫的評論文章，重要層級雖不及黨的重要意識形態文件（如：黨的集體歷史決議、黨代表大會報告、最高領導人著作等）。但這類評論文章在討論意識形態議題時，必須用更親和的語氣、口吻詮釋，以面向大眾。這與中共報刊遵循的特殊「新聞學」有關，評論文章在黨的宣傳體系屬於「理論工作」，一方面要闡釋當前黨的意識形態路線、方針，但得面向「大眾」而「通俗化」，不宜使用晦澀語言（盧文昭，2016）。官僚組織在這種書寫文章的過程，對意識形態工作有了裁量空間。Tsai 與 Kao（2013, pp.404-405）分析「寫作組」是種中共決策

註⑫ 中央文革小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是毛不滿當時黨內智囊成立，設立地點最初在遠離政治中樞的上海。MacFarquhar 與 Schoenhals（2006）認為這是有意為之，以規避鄧小平主管中央書記處的監督。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數仍是意識形態系統出身（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p.33, pp.45-46）。

註⑬ 如中央組織部的寫作組「仲祖文」、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寫作組「鍾軒理」等，這些寫作組不僅會在機關刊物使用，也會以筆名方式投稿《人民日報》（Tsai and Kao, 2013, pp.401-402）。

過程碎裂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展現，「寫作組」作為官僚組織代言者，能表達特定立場，又能保持黨一致對外的「集體和諧」，能避免黨內歧見浮上檯面，被外部敵對勢力察覺。據此，Wu（2015）曾將中共黨代表大會報告的撰寫，解釋成意識形態的「輸入」（input）過程。官僚組織在黨章與報告撰寫與修改過程，提供意見與參與書寫，協助制定黨的意識形態路線。^⑭黨報「寫作組」機制，則反映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輸出」（output）過程，官僚組織在意識形態出臺後，以書寫策略，對意識形態的「輸出」進行反饋（feedback）與局部修正。揭示「寫作組」機制，有助理解意識形態書寫過程的複雜性。

參、理論檢視

中共意識形態詮釋權專屬領導人的特性，使傳統學界討論，集中在領導人對意識形態理論的產出與反饋過程，及意識形態如何反應中共黨內宏觀政策的調整，相關研究較少關注中層官僚部門在意識形態決策過程的影響力（李英明，2003，2011，2017；陳璋津，1988，1995；Meisner，1999；Schurmann，1968）。李英明（2003，2017）將這種產出方式稱之為「意識形態工程」，他以「集體智慧結晶」形容 1980 年代後歷任領導人透過修改意識形態，為其歷史地位背書，並擴張政策實踐性。不過這些解釋，多少忽略中共意識形態在 1980 年代後，由於元老與高層間對政治經濟發展路線的分歧，使意識形態協商過程，充滿衝突與妥協。諸多研究也指出，1980 年代後歷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黨史決議諸多關於意識形態路線的討論，是派系權力平衡的產物（陳璋津，1988；陳永發，2001；楊繼繩，2004；Wu，2015）。就此，意識形態的書寫過程與其說是「集體智慧結晶」，其實也顯示他與一般中共官僚體系制定政策的過程沒有差別。

近期討論，觸及意識形態如何產生的真實樣態，包括：意識形態機構如中宣部如何操作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高層智囊機構在制定意識形態的作用、領導人如何透過意識形態集體學習約束同僚（如：中央政治局定期召開的集體學習會議）。一些討論則指出意識形態如何基於對外輸出的需要，包括與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結合，迎合當代國際社會的人權與對外援助論述，及對其外交行為的正當性背書等

註⑭ Wu（2015）對 1990 年代中共黨代表大會報告撰寫過程的分析顯示了，黨代表大會的報告草擬會先經過多個跨官僚機構組成的專題小組的事前協商，再送交地方座談會審議，以徵求地方官員與社會群體意見，最後才會交付政治局與常委會，進行最終的審議與修改。

（洪敬富、司昕山，2016；Brady, 2008；Lynch, 1999；Patapan and Wang, 2018；Tsai, 2017；Tsai and Dean, 2013）。這些討論，說明意識形態制定的體制面、官僚角色與博弈過程等因素愈被重視。

就此，Brødsgaard 與 Chen（2019, pp.25-27）以碎裂威權主義的視角，歸納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的討論，指出這些討論可歸納為兩個層面：一是組織層面，包括制度行為者、黨宣傳機構的工作流程與決策機制。二是論述層面，包括領導人關於意識形態的言論、演講與文章。在實際決策流程，這兩者有時會互為影響。而一些外部環境因素，如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內部民意輿論、市場化程度等，也會影響意識形態的制定（Brady, 2008; Lynch, 1999; Shambaugh, 2007）。一些分析顯示，中共外交陳述受到領導人、官僚組織及其官僚、國際組織與社會壓力等諸多因素影響。Mokry（2023）分析習近平時期的外交陳述指出，不能忽略總書記、總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長等行為者的差異。Duckett（2019）、Jones 與 Hameiri（2021）、Ye（2023）引入碎裂威權主義觀點，強調不同官僚組織在中共涉外論述作用，這些探討認為外交部在涉外論述無法一錘定音，宣傳系統或對外經貿、援外、扶貧等官僚組織影響日趨提升。Cabestan（2021）、Hu（2019）分析指出在習近平時期，外交決策的組織碎裂化狀態，雖逐漸朝一體化趨勢整合，但這種趨勢仍是高度不穩定的，官方在外交行為與陳述的「不一致」非常常見。¹⁵

本文討論的冠名意識型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制定過程大致牽涉到三個官僚系統，包括主管中共外事決策的最高機構：中央外事委員會及下轄主要機構，這個機構並由習近平本人擔任主任，由委員會秘書長王毅（兼任下轄辦公室主任）負責實際業務與議程制定（Tsai and Zhou, 2019）。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宣傳系統、負責外交政策規劃的中國外交部。我們認為基於碎裂威權主義的邏輯，三個官僚系統基於日常書寫的陳述慣性，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陳述也會有差異。本

註¹⁵ 作者感謝一位審查人指出碎裂威權主義討論的「部門本位」現象，不限威權國家而在民主國家也極為常見的疑問。就此，一系列討論中共意識形態與宣傳體系的文獻，如：Brady（2008）、Brødsgaard 與 Chen（2019）、Shambaugh（2007）、Tsai（2017）、Tsai 與 Kao（2013）、Tsai 與 Zhou（2019）等，他們分析突顯意識形態部門能夠介入現有政治體系運作，干預國家的經濟與外交決策，正是基於這種碎裂威權主義體制設計，譬如官方意識形態部門能藉由黨政體制（黨委會設計）、或跨部門決策小組（中央領導小組）、或黨國宣傳體制與官方媒體的嚴格控管（由跨部會機制管理官方輿論的輸出）等，來影響整體的政策流程，這些體制設計事實上在一些威權國家都極為罕見。我們的案例呼應前述研究，指出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書寫流程已經「鑲嵌」進整個黨國體制，官僚政策制定必須受官方意識形態系統的制約，必須學習調適這種書寫過程。

文據此結合使用研究方法，提出以下研究預期。^{①⑥}

第一，基於碎裂威權主義下的「部門本位」傾向，我們預期官僚系統陳述冠名意識型態時，語句陳述慣性會有差異，也就是他們在語句陳述上會「連結」不同的詞組，這種情形在自然語言演算法稱為詞組的共現關係（co-occurrence）。而本文 TextRank 演算法萃取文本時，三個官僚系統關鍵詞的字詞網絡圖（即：關鍵詞的共現詞組）就有大幅差異，^{①⑦}我們提出研究預期一：

研究預期一：三個官僚系統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時，陳述慣性的差異，使演算法萃取後的關鍵詞字詞網絡圖（即：關鍵詞的共現詞組），會有大幅差異。

第二，基於同樣邏輯，我們預期官僚系統陳述冠名意識型態時，陳述內容會有差異，由於官僚系統的本位主義，使他們偏好的議題本來不同，在陳述冠名意識型態會加入各自在意的議題。TextRank 演算法萃取文本時，三個官僚系統關鍵詞使用頻率因此有大幅差異，我們提出研究預期二：

研究預期二：三個官僚系統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時，陳述內容的差異，使演算法萃取後的關鍵詞使用頻率，會有大幅差異。

第三，基於研究預期一與研究預期二，官僚系統關鍵詞陳述慣性與內容的差異，我們預期本文使用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會由此標示出三個官僚系統立場的差異，故三個官僚系統的空間模型點分布會有大幅差異，我們提出研究預期三：

註①⑥ 作者感謝一位審查人提出的意見。由於本文實證分析是討論官僚組織（個人）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陳述差異，不涉及因果關係的變項關聯性檢驗，在參考相關研究後，本文以「研究預期」取代常見「研究假說」用詞（黃信豪，2023，頁 11-13）。諸多關於社會科學量化文本分析（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方法發展的討論，也都強調這類工具是幫助使用者「更有效率」閱讀文本。這涉及如何使用演算法進行文本分析，並以數據或視覺化呈現具代表文本特徵的詞組、或建立詞組間慣用的連結，捕捉文本陳述慣性特徵（Grimmer and Stewart, 2013；Gentzkow et al. 2019；邵軒磊，2019，2024）。在這意義上，量化文本研究多數時候是種描述推論（descriptives inference）。除非研究者將摘要結果視為一組變數，並用其推論解釋某些現象，在這層次才會涉及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Grimmer 與 Stewart（2013）就說明研究者應妥善處理捕捉文本陳述慣性特徵的問題後，再探索研究主題是否有發展因果推論的空間。

註①⑦ 本文所指關鍵詞是官僚系統具代表性而高頻率「使用字詞」，頻率指的是在某一字詞出現的次數。

研究預期三：三個官僚系統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時，由於陳述慣性與內容的差異，使標示關鍵詞詞組立場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的點分布，會有大幅差異。

第四，我們認為碎裂威權主義下的「部門本位」傾向，會約束官僚個人的立場發言。就此，特定官僚仕途橫跨多個官僚系統的特殊案例，提供我們檢視前述預期的機會，我們認為官僚若轉換不同官僚系統，他的陳述立場就會出現改變。另外，基於前述意識形態「集體性」特徵與「部門本位」的影響，我們預期官僚系統（與個人）陳述冠名意識型態時，與習近平本人陳述個人冠名意識型態都會有明顯差別，我們提出研究預期四與研究預期五：

研究預期四：官僚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時，立場受到所屬官僚系統制約，但他若有不同官僚系統任職的經驗，其在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的點分布，就會有大幅差異。

研究預期五：習近平本人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時，其在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的點分布，與三個官僚系統（及個人）相比，會有大幅差異。

肆、資料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

本文文本資料來自《人民日報》201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報刊評論文章。^⑱在蒐集過程，先以《人民日報》線上資料庫關鍵字檢索功能，尋找「習近平外交思想」的主題文章，性質屬於《人民日報》社論、編輯部文章、評論員文章、「寫作組」文章、及官員署名特約邀稿納入分析，但官員在公開場合講話、或受記者專訪，提及「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報導或訪談文章不納入。^⑲在資料登錄，每份資料會包括：刊載時間（年月日）、刊載版面、作者（及

註⑱ 我們資料取自《人民日報》海外代理 OriProbe Information Services 公司線上資料庫，網址：https://oriprobe.com/peoplesdaily_tc.html。

註⑲ 這類報導不算官方定義「理論文章」故不納入分析。這類報導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陳述也較零

所屬單位)、標題、內文。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登版面,集中在以下四類:要聞版、評論版、理論版、國際版與學術版,這些是官方報紙涉及意識形態的文章會刊登的版面。如《人民日報》理論版,是官方新聞學定義「理論工作」文章(涉及意識形態理論)專屬版面,是官僚、官方智庫學者與專家的專文分析,深入闡釋當前黨的意識形態路線。另外,從作者所屬單位根據前述討論標記為三個官僚系統:中共中央外事系統、中共中央宣傳系統與中國外交部。

除《人民日報》資料外,我們蒐集習近平陳述自己的冠名意識形態資料,以比較官僚系統與習近平立場的差異,這類資料主要見於習近平出席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針對個人冠名意識形態的講話。我們發現,習近平指稱自己冠名意識形態的方式,沒有違背黨史的慣例,即領導人不會在會議與公開場合,「具名」指稱冠名意識形態。^①譬如根據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會後公報,出席者發言提及冠名意識形態使用的是「具名」的全稱(或簡稱),但領導人發言使用是「沒有具名」的全稱。以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為例,習近平在該次會議做了〈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重要講話。他表示:「我國對外工作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牢牢把握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這條主線……。」(雙引號為作者所加)(習近平,2018,頁537)。而會議主持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指稱「習近平外交思想」;總結講話的中央外事委員會秘書長楊潔篪則直接使用「習近平外交思想」一詞(新華網,2018)。^②

因此,習近平在會議與公開場合是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代稱「習近平外交思想」,^③我們將這類資料歸類在為中央外事系統下。^④綜上所述,

碎,時常太過口語化,無法呈現受訪者對意識形態的完整理解。

註① 如:毛澤東於某次會議對「毛澤東思想」做出指示,或對「毛澤東思想」表示意見。

註② 楊潔篪總結講話可見註3。另外,習近平在公開場合也是如此陳述,在2023年他接見中國外交部駐外使節的會議,他說:「強化擔當作為,做奮勇開拓的創業者。大家要學懂弄通做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雙引號為作者所加),與會外交部長王毅發言直接使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稱(新華網,2023)。

註③ 嚴格來說,我們是基於公開會議文件、領導人著作、報導確認習近平遵循這項陳述慣例,但不能保證他在會議私下沒使用「習近平外交思想」這個詞。另外,習近平在陳述整個冠名意識形態體系「習近平思想」時,也都遵循此慣例。就如前言所述,「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思想」一個組成部分,「習近平思想」下有許多分支,如「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等。而習近平本人於中共十九大做的報告,他即是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代稱正式官方文件使用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習近平強軍思想」,以避免自己具名指稱冠名意識形態(新華網,2022)。

註④ 這些資料主要取自「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時代中國外交」網站,該網站由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和

本研究分析的總計文本共有 192 篇，標記分類標準可參照表 1。

表 1 作者所屬官僚組織與官僚系統的分類

官僚系統	涵蓋代表性機構或個人
中共中央外事系統	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¹ 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²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³
中共中央宣傳系統	人民日報評論員 人民日報「寫作組」（署名：任仲平 - 人民日報重要評論） 人民日報國際部「寫作組」（署名：鐘聲、國際平、國合平） 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寫作組」（署名：聞言） ⁵ 中共中央黨校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中國外交部	外交部官僚與所屬部門 ⁶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⁷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

說明：僅列出部分代表性團體或個人。

備註：1. 習近平的資料取自他在中共中央外事會議關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講話。2. 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文章皆由機關首長具名發表（資料蒐集時間有王毅、楊潔篪任職）。3.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皆由機關首長具名發表（資料蒐集時間有劉建超、王家瑞、宋濤任職）。4. 人民日報國際部寫作組使用署名討論見 Tsai 與 Kao（2013）、人民日報國際部（2019）、連雋偉（2019）。5. 聞言是習近平主政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新署名（賈世煜，2015）。6. 外交部在《人民日報》署名發表評論文章有由外交部官僚具名發表、及以機構名義發表。官僚部分，包括：現任外交部長王毅（十八、十九屆第一次任部長，二十屆後升任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秦剛事件」後再度兼任外交部長）、原外交部部長秦剛、現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原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樂玉成、外交部黨委（及所屬理論學習組）、部分國際組織常駐代表與駐外大使等（如：原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張漢暉等）；機構名義則包括外交部黨委（及其下轄理論學習組）等。7.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為外交部所屬事業單位，2020 年由外交部委託成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鄭明達，2020）。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者在《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單位署名通常兩者擇一：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或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學者身分署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共同承建。網站完整收錄「習近平外交思想」官方著作電子版，與習近平在對外場合的講話。網址：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node_8020207.shtml。

二、研究步驟：關鍵詞萃取與空間點估計

我們研究策略結合自動摘要生成技術（Automated Text Summmerization）與國會研究估計政黨立場位置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Poisson Scaling Model）。在研究步驟，第一，以 Universal Dependencies 語言模型對中文文本斷詞，再以 TextRank 演算法，提取代表性的關鍵詞。第二，以這些關鍵詞為資料，使用空間模型估計。結合兩者的方法，我們首先估計各官僚組織在詞頻的變化，再根據這些詞頻估算官僚組織、或個人所屬的空間位置。具體研究步驟，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一）使用TextRank自動萃取關鍵詞

我們先以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 TextRank 演算法，標記文本中重要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是萃取（Feature Selection）自文本，又可作文本的短語（phrase），代表文本的主要特徵。^② TextRank 演算法最早是由 Mihalcea 與 Tarau（2004）發展，他們將 Google 索引 PageRank 演算法應用至自然語言處理的關鍵詞（短語）的萃取。演算法會從每分文件中選擇出一組最能描述和總結這分文件的「詞組」，建立一套基於文本內容的「特定語典」。在給定這組語典的條件下，萃取詞組會是摘要與分類所有文件的近似最小訊息集合（near-minimum information set）。TextRank 演算法幫助我們捕捉文本的語句結構、及語句字詞，還有字詞間的相依關係。由於演算法考慮了語句的依賴性、分詞結構與文法使用的邏輯關係，萃取出來的關鍵詞更具實質意涵，更能捕捉分析文本特性。

TextRank 演算法在演算過程會先將文件分割成若干組成字詞（term）單元，計算每個字詞出現的頻率，構建節點（vertex）連接圖，並以不同句子間字詞的相似度作為邊（edge）的權重，以 Pagerank 演算法循環迭代計算字詞的 TextRank 值，最後抽取排名高的字詞組合成文件摘要。^③就此，一個句子可能會有多個節點（vertices），句子是透過節點相連，邊的權重反映句子之間的相似程度所形成的共現關係（co-occurrence）。因此，TextRank 演算法又被稱為圖像式演算法（graph-base ranking algorithms）。

萃取關鍵詞前，首先，先要把各個文件進行斷詞處理。我們的斷詞工具使用自

註② 本文所指的短語，是指由複合形式構成的字詞，如複合名詞（compound-noun）、或形容詞加形容詞、形容詞加名詞的字詞。由於中文的語句常會以不同形式的匹配單字，若沒經過自然語言演算法的處理，可能會遺漏文本中重要的字詞。

註③ TextRank 演算法按照相似度矩陣（similarity matrix）計算字詞重要性，以此對詞句進行排序，選擇出最重要的字詞與短語（phrases）。

然語言處理的依存句法分析樹（Universal Dependencies Treebank）訓練斷詞，依存句法（Universal Dependencies）是一個跨語言語法的標註框架，相關學者訂定了跨語言標註分析的準則，涵蓋語言已 90 種，包含中文（Nivre et al., 2016, 2020）。我們使用 Universal Dependencies 2.5 的語言模型，對文本斷詞與詞性標注（part of speech tagging），原始語句會形成 n 個連續單詞構成的序列（在自然語言處理被稱作 n 元語法， n -gram），字詞則依照對應詞性標記（tokenize），如名詞、動詞、形容詞、標點符號等。一旦字詞的語言特徵被正確標記，我們再透過 TextRank 萃取關鍵詞，即將 n 元語法（ n -gram）配對成一組組的名詞短語。斷詞後字詞即構成語句間若干集合的節點（vertices），再進行計算。

式（1）以數學式表達 TextRank 演算法， $V(i)$ 表示任一節點 i 在文件中的數值， d 為阻尼係數（damping factor），表示節點間連結的機率， $Link(i)$ 則為共享節點 i 的樣本（文件）， p_{ij} 測量節點 i 連結到節點 j 絕對權值（absolute weight value）， $\frac{p_{ij}}{\sum_{V(i) \in Link(i)} p_{ij}}$ 則表示節點 i 連結到節點 j 相對權值（relative weight value）。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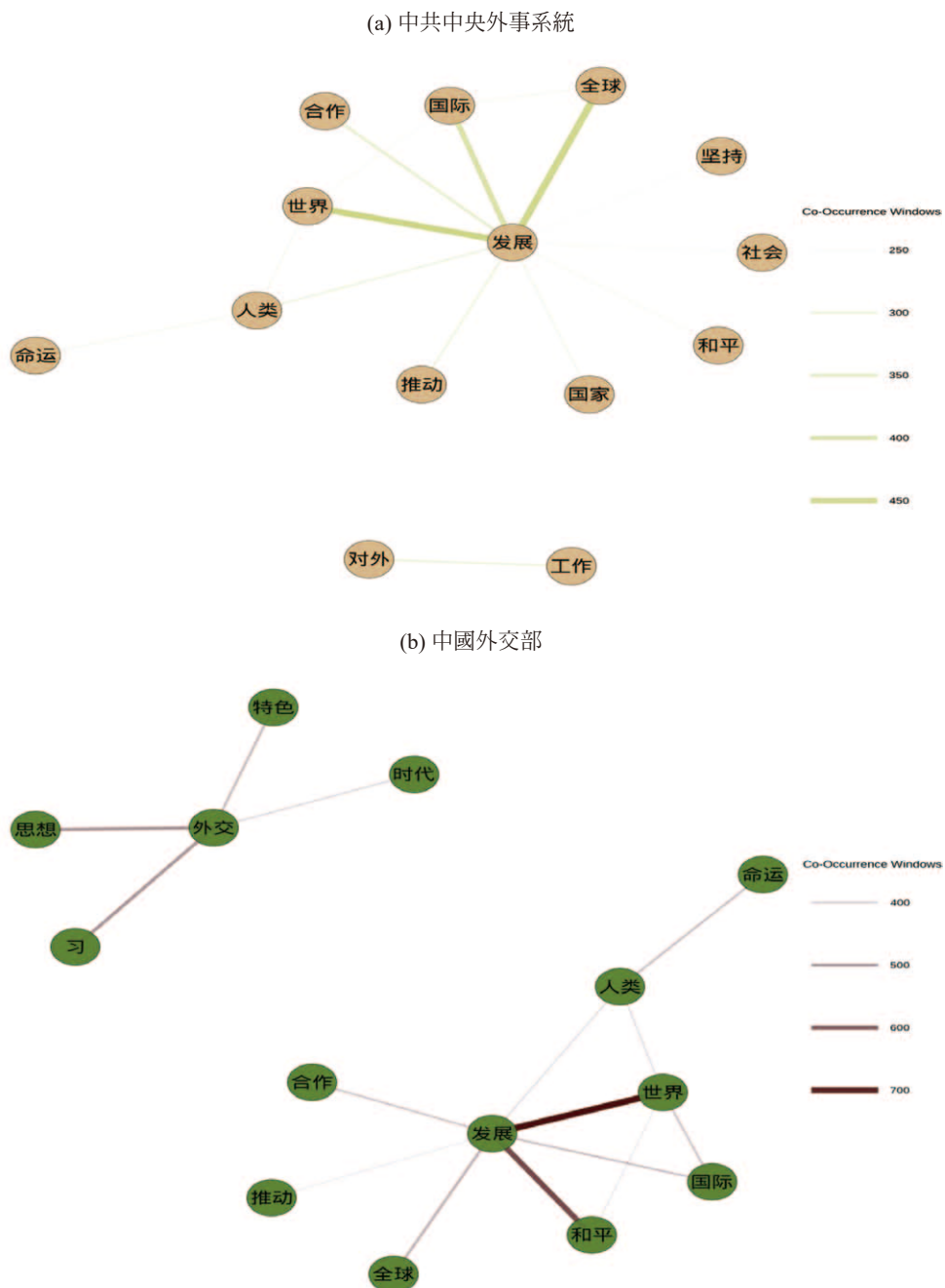
（1）可得，計算文本中節點 i 重要性的值，是與 i 相關所有節點的權值之和，絕對權值 p_{ij} 與節點 j 連接節點 i 的頻率正相關。^⑥TextRank 演算法因此考慮了文本之間的語言依賴性（linguistic dependence），演算法會排除和關鍵詞共現頻率較低、且語句表達形式較不類似的文本。而節點出現頻率愈高的文本，則又可稱作標記文本（tokened text），演算法會計算這類標記文本較多次。

$$V(i) = (1 - d) + d \sum_{V(i) \in Link(i)} \frac{p_{ij}}{\sum_{V(l) \in Link(i)} p_{il}} V(j) \quad \text{式（1）}$$

為了說明關鍵詞如何被提取的，我們以字詞視覺化網絡圖（network plot）呈現三個官僚系統發表在《人民日報》評論文章，15 個共現頻率較高的名詞和形容詞（co-occurring nouns and adjectives）網絡圖。圖 1 顯示這些形容詞和名詞在評論文章中同時出現的頻率，我們把網絡圖的字詞就是節點（vertex），連接字詞的線就是邊（edge），表示兩個字詞的相似度分數。相似度愈高，反映的是兩個字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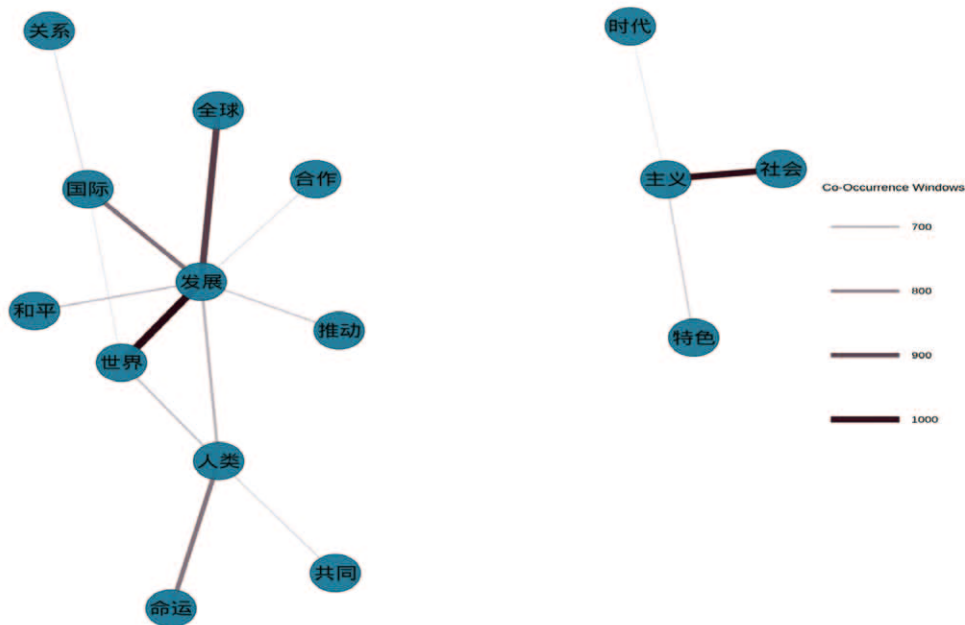
註⑥ 我們假定節點 i 連結到節點 j 構成網絡圖是無向的（undirected），也就是 i 與 j 的關係不需依循特定語法邏輯，可前後顛倒。Mihalcea 與 Tarau（2004）分析這假定能否幫助演算法迭代計算與收斂的準確性。模擬顯示，這假定可以增加詞組間的連結性，迭代計算會更快達到收斂，此外，有向圖（directed graph）與無向圖（undirected graph）的結果是重疊的，準確度也相似。

圖 1 官僚系統共現頻率高的名詞與形容詞網路圖（取前 15 個）



(續) 圖 1 官僚系統共現頻率高的名詞與形容詞網路圖 (取前 15 個)

(c) 中央宣傳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

文本中句法的依存度愈高。這些字詞關聯性的網路圖，也有助於理解三個官僚系統語句陳述方式的差異。

第一，中共中央外事系統前 15 個字詞大致構成了一個網路圖，但在字詞間的依存度，外交倡議的字詞，如：發展、全球、國際、世界、合作等字詞，以「發展」為中心，構成一個很強的網路關係。第二，中國外交部前 15 字詞網路圖，明顯有兩組字詞網路圖，一個偏向外交倡議（如：發展、世界、和平等字詞，同樣以「發展」為中心組成一個網路）、一個偏向冠名意識形態（如：習、外交、時代、思想等字詞，以「外交」為中心組成一個網路，即「習近平外交思想」）。第三，中共中央宣傳系統前 15 字詞網路圖，也有兩組字詞網路圖，一個偏向冠名意識形態（如：主義、社會、時代、特色，以「主義」為中心組成一個網路，即「習近平外交思想」），一個偏向外交倡議（如：發展、全球、國際、世界等字詞），此外，中共中央宣傳系統兩個網路圖的字詞的共現度（Co-Occurrence）分數都大於 700，代表其網路連結程度「最高」，更高於其他兩個官僚系統。這說明中央宣傳

系統非常重視特定字詞間的連結，會不斷使用。就此，三個官僚系統字詞網絡圖，都表現三者不同的陳述邏輯（研究預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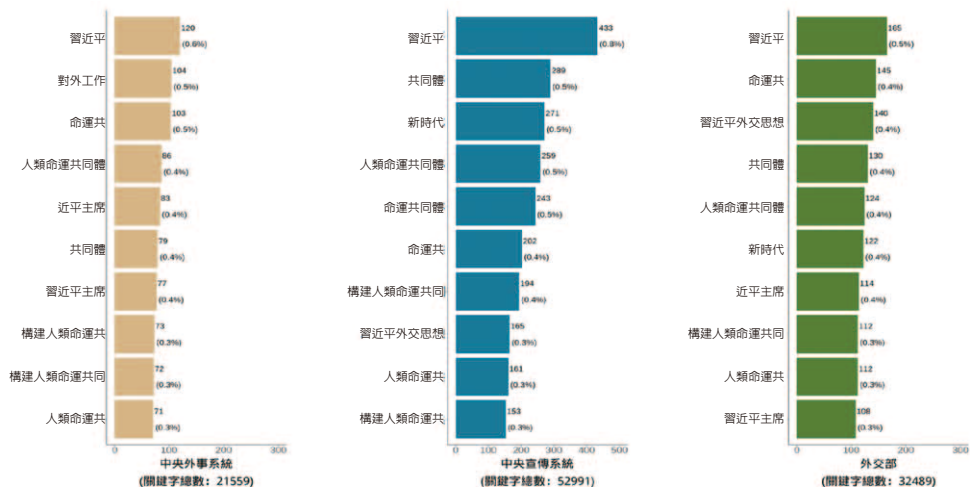
從實質角度，三個官僚系統字詞網絡圖的差異，呼應其業務特性的差異。中共中央外事系統只有一個「發展」為核心的外交倡議的網絡詞組，卻沒有冠名意識形態的網絡詞組，代表他們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內容更重視對整體外交政策的主導性。這與其系統主要機構：中央外事委員會，作為中共外事工作最高議事協調機構，主導外交政策的性質有關；此外，由於習近平實際主導中央外事委員會的運作，中央外事系統的多數陳述因此與習近平個人無關。但在中國外交部與中共中央宣傳系統，都有一個冠名意識形態的網絡詞組，又略有差別，一個是以「外交」為核心，一個是以「主義」為核心。這可能代表中國外交部宣揚「習近平外交思想」時較重視領導人外交理念。而中共中央宣傳部門宣揚「習近平外交思想」時較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念。整體而言，三個官僚系統都試圖將「習近平外交思想」融入各自的需要，針對冠名意識形態進行再詮釋。

字詞視覺化網絡圖幫助我們理解文本使用字詞的共現頻率，並優化後續字詞萃取的品質。在後續字詞萃取處理，我們使用式（1）計算所有字詞的權重（即 $V(i)$ ，與 i 相關所有節點的權值之和），再依靠排序靠前的字詞，組合成至少 3 個字元（3-grams）的字詞與短語（phrase），此即透過 Textrank 產生能代表文件特性的關鍵詞。由於中文的修辭表達，複合形式構成的字詞頻率非常高。這種萃取方式能保留資訊較豐富的複合形式字詞，有利捕捉文本的重要字詞與短語。圖 2 顯示三個官僚系統關鍵詞萃取的長條圖，縱軸標示各官僚系統使用頻率前 10 名關鍵詞，橫軸為頻率次數範圍，長條圖旁數值為關鍵詞頻率次數，括弧內數值是關鍵詞占該官僚系統關鍵詞總數百分比。我們以此為後續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的分析資料。三個官僚系統在關鍵詞使用頻率呈現大幅差異（研究預期二）。第一，三個系統文本使用「習近平」字詞都排名第一，但以使用次數計算，「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宣傳系統的頻率高達 433 次（占總數 0.8%），遠超過其他兩個系統（外交部 165 次，占總數 0.5%；中央外事系統 120 次，占總數 0.6%）。第二，中央外事系統與外交部使用「核心」字詞頻率頗高；但中共中央宣傳系統，「核心」一詞未進入前 10 名，不過「近平主席」一詞進入前 10 名。第三，三者最常提及「習近平外交思想」是外交部，次之是中共中央宣傳系統，中共中央外事系統該詞未進入前 10 名。從關鍵詞使用頻率觀察，三個官僚系統似乎都在做習近平個人輸誠的「表態」，但邏輯可能不同。

從實質角度，仍大致呼應前述有關字詞網絡圖差異的討論。譬如中共中央外事

系統與中國外交部高頻率使用「核心」字詞（即：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代表兩個實際負責涉外工作的系統，有鞏固習近平外交領域權威的「表態」傾向。而中共中央外事系統不使用「習近平外交思想」情況，顯示他們負責整體外交政策的主導性特徵。但中央宣傳系統作為主要制定意識形態的機構，不做「核心」表態，在提及「習近平外交思想」外，高頻率使用「習近平」、「近平主席」等字詞，可能說明他們還會額外凸顯「習近平個人」本身的形象。

圖 2 官僚系統的關鍵詞萃取（取前 10 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

（二）空間點估計

本文使用 Slapin 與 Proksch（2008）發展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估計官僚系統文本立場的空間位置。這是基於應用文本資料估計政黨意識形態立場，發展的空間點估計測量工具。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假定文本資料關鍵詞頻率，會服從泊松機率分布並映射至單一維度空間，以此能估算關鍵詞在單一維度空間的位置。以數學式表達，如 Slapin 與 Proksch（2008），可假定各個官僚系統的評論文章，使用的關鍵詞（字詞／短語） y_{jm} ，出現的字詞頻率服從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如下式（2）。

$$y_{jm} \sim \text{Poisson}(\theta_{jm})$$

$$\theta_{jm} = \exp(a_m + b_j + \beta_j * \omega_i^m) \quad \text{式 (2)}$$

式 (2) 的參數如下： y_{jm} 表示字詞 / 短語 j 在文件 m 出現的頻率，並以元素 (j, m) 儲存成字詞 / 短語 - 文件矩陣 γ ， θ_{jm} 是泊松分配的平均值與變異數。 a_m 是文件 m 的固定效果，代表文件的長度。 b_j 是字詞 / 短語的固定效果，代表字詞 / 短語 j 在所有文件出現的頻率。 β_j 代表字詞 / 短語 j 的特定權重， ω_i^m 表示文件所屬官僚系統 i 的意識形態立場。根據模型定義，當某一特定官僚系統 i ，使用一個詞組的關鍵詞（字詞 / 短語） y_{jm} 頻率較高，這組關鍵詞（字詞 / 短語）的參數 β_j 會以負值標示，官僚系統 i 在單一維度空間模型的立場位置 ω_i^m 就會朝向負向。此時，其他任一官僚系統 i' ，使用另一詞組的關鍵詞（字詞 / 短語） y_{jm} 頻率較高，這組關鍵詞（字詞 / 短語）的參數 β_j 會以正值標示，官僚系統 i' 在單一維度空間模型的立場位置 ω_i^m 也就會是正向。就此，Slapin 與 Proksch（2008）使用正向或負向是便於建立一個單一維度的空間模型， $\beta_j * \omega_i^m$ 是個介於 -1 與 +1 的值，數值是根據關鍵詞頻率估計官僚系統 i 的相對位置後給定的，這數值不能等同於真實世界意識形態立場（如立場偏左或立場偏右）。數值介於 0 的關鍵詞詞組，就是所有官僚系統 i 共享的關鍵詞詞組。^⑦

我們使用 Liao 與 Tsai（2024）發展的改良 Wordfish 模型，這個改良 Wordfish 模型與原始 Wordfish 模型不同，透過運用 Imai、Lo 與 Olmsted（2016）改良方法，以最大期望演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 EM）計算字詞 / 短語 - 文件矩陣 γ 的聯合後驗分布（full joint posterior distribution）。這種方式與 Slapin 與 Proksch（2008）使用的馬可夫鏈蒙地卡羅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得出數值相近，計算時間更短，改良後 Wordfish 模型在計算關鍵詞將更為精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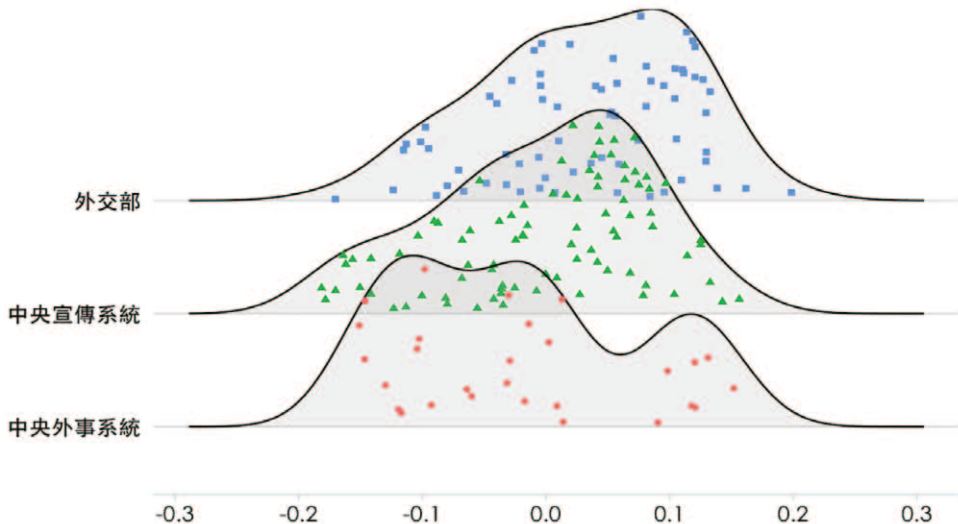
伍、主要分析結果

圖 3 是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對三個官僚系統整體文本立場的分析，我們以

註⑦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是 Slapin 與 Proksch（2008）分析西方國會政黨左右意識形態發展的空間點估計策略。這個模型假定左右意識形態會有各自偏好的陳述語詞，且預設左派政黨有一群代表性關鍵詞組，右派有一群代表性關鍵詞組，兩組關鍵詞分別位於 -1 與 +1 的位置。0 的位置是一個左右政黨雙方共享的關鍵詞組，共享關鍵詞組代表雙方對議題有些共通性偏好而使用的語彙。

山脊線圖 (ridgeline plot) 表示，橫軸 (數值範圍：-0.2 至 +0.2) 是用於標示官僚系統相對立場位置，縱軸分為三個官僚系統。任一點代表個別官僚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文章。^⑧紅色圓點是中共中央外事系統，綠色三角形點是中共中央宣傳系統，藍色方形點是中國外交部。一個官僚系統點分布密度若愈集中，山脊線圖波形會愈形成波峰，表示官僚系統內部的立場愈相近；反之，點分布密度若愈離散，山脊線圖波形會愈平緩，表示這個官僚系統內部的文本立場愈不一致。另外，橫軸數值由模型根據關鍵詞的字詞頻率與特徵，估計任一個別官僚相對位置後給定的。精確說，這反映三個官僚系統在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關鍵詞使用的差異。如果任一官僚系統大部分點分布都集中於 0，則說明他傾向使用所有官僚系統「共享的」關鍵詞詞組。點分布集中度愈接近 -0.2 或 +0.2 的官僚系統，他們使用關鍵詞詞組屬於模型兩個最極端的位置，立場差距最大。^⑨譬如，有一個官僚系統在位置上愈接近於 -0.2，則這個官僚系統使用的關鍵詞詞組，會與位於 +0.2 差異最大。

圖 3 三個官僚系統的空間點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

註^⑧ 山脊線圖是 R 繪圖套件 ggplot2 擴充語法，他與呈現變數數值分布 (distribution) 的密度圖 (density plot) 類似，但便於比較單一變數在不同組別數值分布的情形。語法可參照：<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ribes/vignettes/introduction.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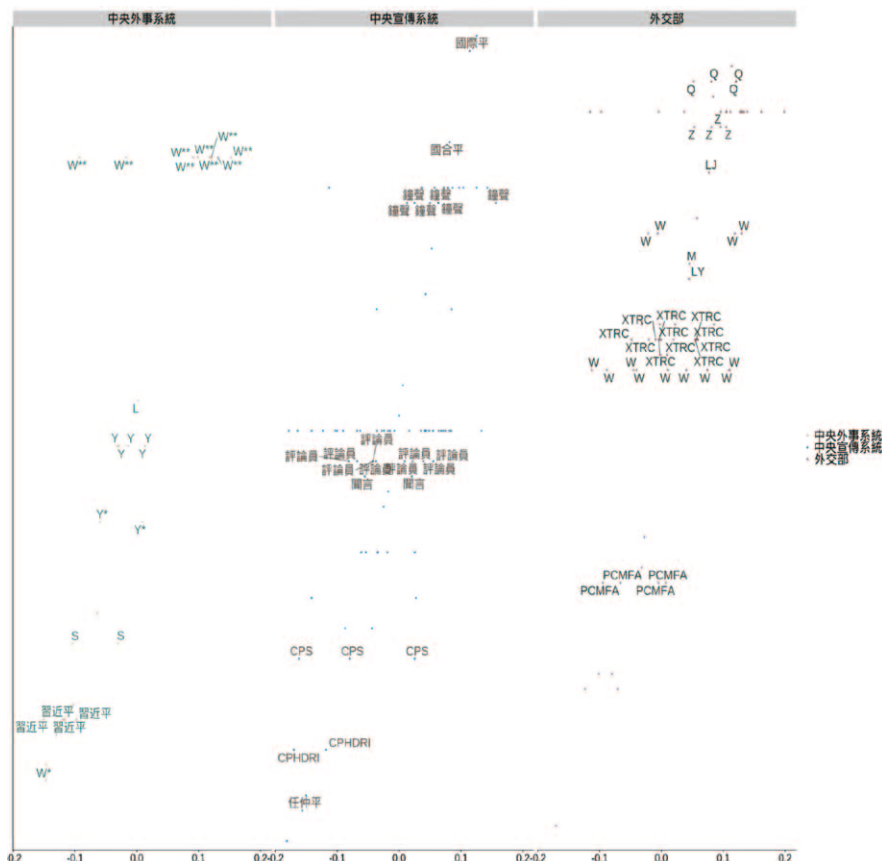
註^⑨ 可參照註 27 的說明。

從點分布的空間位置觀察，中共中央外事系統的波鋒，一個集中約 -0.1 位置，另一個集中在 $+0.15$ 位置，另有一個波鋒不明顯但集中在 0 位置。中國外交部的波鋒一塊集中在 $+0.1$ 位置，同樣有一個波鋒不明顯但集中在 0 位置。中央宣傳系統的波鋒集中在約 $+0.05$ 位置。可以推論，中央外事系統內部在陳述邏輯上，有兩個群體，一個群體偏好使用其他官僚系統，最少使用的關鍵詞詞組（ -0.1 位置）；另外一個群體使用的關鍵詞詞組，與中國外交部官僚使用的關鍵詞詞組相近（ $+0.15$ 位置）。中央宣傳系統主要使用三個官僚系統共享的關鍵詞詞組（波峰最接近 0 ）。比較有趣的，比對資料後可發現中央外事系統集中於 -0.1 位置的點，是習近平主持中央外事會議關於「習近平外交思想」工作的講話，這說明習近平的講話，多數時與其他官僚組織（或個人）立場有明顯差距。^⑩從理論意義，這還說明中共中央外事系統的立場，符合外界觀察中共黨政分離的「雙軌外交」遺緒（楊宗新，2021；Armstrong, 1977；Lampton, 2014；Tsai, 2017）。中央外事系統一些官僚立場，和習近平本人立場相近，但也有官僚的立場接近中國外交部。整體而言，模型顯示，三個官僚系統由於前述關鍵詞詞組的差異性，立場位置因此不同（研究預期三）。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還能解析個別官僚組織（個人）的立場差距，我們將模型點估計值映射成三個子圖以方便解讀，如圖 4。圖 4 標示了三個官僚系統具代表性官僚組織（個人），子圖上任一個點代表官僚組織（個人）在某一時間於《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若同一官僚組織（個人）在不同時間發表評論文章則會有多個點，標示對象可參照圖 4 說明。^⑪具體解讀方式如下述，如：右欄外交部標示 W 的點，是現任中央外事委員會秘書長兼外交部長王毅，第一次外交部長任內（時間：2013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於《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文章。W 有幾個點位置在 -0.1 ，代表這些評論文章與左欄中央外事系統的習近平在中央外事會議的講話立場類似（習近平的點分布集中於 -0.1 ），以下茲分述之。

註⑩ 不過在後文圖 4，仍能發現相當比例的中央宣傳系統官僚的發文，與習近平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立場相近。

註⑪ 圖 4 底部橫軸尺度與圖 3 一致（數值範圍同樣是 -0.2 至 $+0.2$ ），模型點估計值與圖 3 相同。縱軸點的位置高低不具判讀意義，僅便於用數字標示點的官僚組織（個人）。

[illegible]

說明：1. 中共中央外事系統：W* 是現任中央外委會秘書長王毅的評論（時間：2023 年 1 至 6 月）、W** 標示王毅回部兼任外交部長的評論（時間：2023 年 7 月～至今）。Y 是原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篪，Y* 是楊潔篪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改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後的評論。L 是現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S 是原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現任國務院國臺辦主任）。2. 中共中央宣傳系統：CPS 是中共中央黨校，CPHDRI 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任仲平」是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作組筆名，「評論員」是《人民日報》本報評論員，「聞言」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寫作組的筆名，「鐘聲」、「國際平」、「國合平」是《人民日報》國際部寫作組筆名。3. 中國外交部：W 是外交部長王毅在第一次任期內評論（時間：2013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Q 是原外交部長秦剛，M 是現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正部級），LY 是原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樂玉成，Z 是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張漢暉，LJ 是原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曾任國臺辦主任、現任中國海協會會長），PCMFA 是外交部黨委（及其下轄理論學習組），XTRC 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

首先，在中共中央外事系統，標示現任中央外事委員會秘書長兼外交部長王毅（W* 與 W**）、原中央外事委員會秘書長楊潔篪（已退休，Y 與 Y*）、原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現任國務院國臺辦主任，S）、現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劉建超（L）等人於《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這些外事機構首長的評論，除王毅外立場都大致相近（點分布大多集中在 0）。另外，我們以 Y 與 Y*，分別標示楊潔篪在中央外事委員會改組前後的評論文章。根據 2018 年 3 月中共中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改組成中央外事委員會。作為中共外交體系第一把手，楊仍擔任改組後的秘書長，有些解讀將此次機構改組視為習近平個人擴權的舉措，以強化中央外事委員會與外交部「主從地位」（楊宗新，2021；Tsai and Zhou, 2019）。但模型顯示，楊改組前後評論文章立場無明顯差異，機構改革應未改變他個人立場。我們還以 W* 與 W**，分別標示王毅 2023 年 1 月後升任中央外委員會秘書長、2023 年 7 月因「秦剛事件」後「回鍋」兼任外交部部長的評論文章。王毅在 2023 年 1 月至 7 月間只有一篇評論，點位置接近 -0.15，和習近平立場相當接近。但 2023 年 7 月兼任外交部長後，除少數點與習近平立場較接近外，多數點位置都集中於 +0.15，點位置和多數外交部部級官員相近。^③有趣的，這與王毅在第一次擔任外交部長時的立場不完全一致。王毅「回鍋」外交部長後，反而遠離習近平的立場。

第二，在中央宣傳系統，我們觀察到不同官僚組織的文本其實分成三個聚落。在中央黨校（CPS）、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CPHDRI），點位置多數集中在 -0.1 與 -0.2 的區間。代表《人民日報》主要立場的本報「評論員」、中央文獻研究室寫作組「聞言」，點位置集中在 0，「任仲平」只有一篇關於冠名意識形態評論，這篇評論位置在 -0.1。《人民日報》國際部寫作組如：「鐘聲」、「國際平」等、點位置集中在 +0.1 與 +0.2 的區間。三個聚落顯示了中央宣傳系統下轄機構在冠名意識形態陳述微妙的立場差異，如：本報「評論員」、中央文獻研究室寫作組「聞言」的立場，與中央外事系統的楊潔篪立場相近，點位置「趨中」。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任仲平」與習近平本人最近。《人民日報》國際部寫作組，點分布卻與外交部的多數官僚最相近（參照圖 4 右欄外交部分布圖）。整體而言，這說明中央宣傳系統的下轄機構，立場比預期離散。^④

第三，中國外交部我們標註多位外交部部級官員，如：外交部長王毅（第一任期評論，W）、原外交部長秦剛（Q）、現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M）、

註② 如原外交部長秦剛（Q）在因醜聞事件去職前，他的報刊評論點位置多集中於 +0.15。

註③ 不過參照圖 3，中央宣傳系統下組織文本的一致性仍是三個官僚系統中最高的。

原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樂玉成（LY）、部分駐外國家與國際組織大使、下轄智庫單位。整體觀察，這些外交官僚的立場相當相近，點分布多數集中在 +0.1 與 +0.2 區間。但王毅第一任外交部長的立場頗為游移，點分布散布在 -0.2 與 +0.15 區間，範圍相當大。這時期王毅的評論文章，一些立場與中央宣傳系統官僚機構，如：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及習近平比較接近。另外，外交部推廣「習近平外交思想」工作成立的新智庫單位，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XTRC）（鄭明達，2020），點分布多集中在 0 與 +0.1 區間，評論大致與多數外交部官僚立場接近，但有些比較偏向習近平。而負責外交部黨務工作的外交部黨委（PCMFA）的評論，立場與習近平最近似，點分布在 0 與 -0.1 區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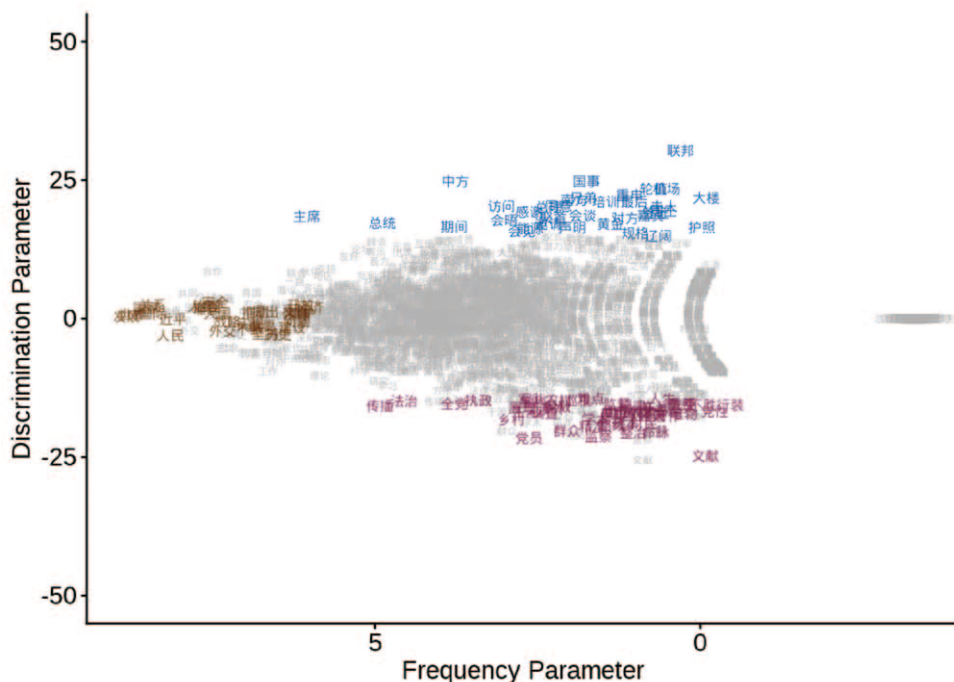
整體而言，模型顯示三個官僚系統內部的官僚組織（個人），點分布呈現多樣性（研究預期三）。此外，王毅案例略為違反研究預期四的官僚個人由於機構轉換，會轉換陳述立場的情況。王毅升任中央外事委員會秘書長後，立場一度與習近平相近。但「回鍋」外交部長，陳述背離第一任外交部長游移的立場；立場現在相當穩固，和其他外交部部級官員一致。但整體而言，這仍印證機構轉換，會改變官僚陳述立場的情況。我們分析也呼應前言提及的觀察，習近平主政後意識形態「個人化」現象，及「習近平外交思想」作為冠名意識形態，沒有改變涉外官僚組織（與個人）的陳述慣性（研究預期五）。習近平本人對於「習近平外交思想」的講話，雖然改變一些官僚陳述「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立場。有些官僚可能以此「表態」，但表態卻限少數官僚組織或個人（如王毅）。而外界觀察認為立場上最能反映中共中央的中央外事系統，系統內部立場卻相當不一致（空間模型有兩個波鋒，一個以習近平為主、一個以王毅為主，還有一些官僚的立場趨中位於 0）。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另一優勢，是可將估計參數的關鍵詞以視覺化方式表達，交叉驗證點空間點估計結果，並討論官僚組織究竟使用哪些關鍵詞詞組，標示差異（Slapin and Proksch, 2008）。圖 5 為 Wordfish 的空間模型關鍵詞圖，縱軸是鑑別參數（Discrimination Parameter）代表是關鍵詞的空間位置，如前述，關鍵詞權重接近 0 是所有官僚系統共享關鍵詞詞組，相對地，愈接近極端值的關鍵詞詞組（數值愈大或愈小），代表立場極化官僚使用的詞組。橫軸是頻率參數（Frequency Parameter），共享關鍵詞詞組（褐色字體）由於是最多官僚系統使用的，因此頻率會愈高，相對地立場愈接近極端值的關鍵詞詞組，字詞頻率也會愈少。³⁴就此，

註³⁴ 這些數值同樣不能等同於實際的意識形態立場（如立場偏左或立場偏右），可參照空間點估計一節的說明。

愈偏上方關鍵詞詞組（藍色字體）是中國外交部使用的字詞，愈偏下方關鍵詞詞組（紅色字體）則是習近平本人、部分中央宣傳系統官僚組織（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使用的字詞。

圖 5 官僚系統的 Wordfish 關鍵詞詞組圖（篩選前 20 個關鍵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

表 2 摘錄了圖 5 關鍵詞詞組，右方光譜（圖 5 偏上方）的關鍵詞詞組，顯示比較偏向外交實務工作（代表中國外交部使用詞彙），如：元首、峰會、援助、協作、建交、復甦、論壇、鐵路等，反映外交部在提及「習近平外交思想」時，以國際的發展援助議題、元首出席高峰會與國際論壇等議題融入論述，彰顯習近平的外交成果，但這同時也提及外交部門的工作成績。左方光譜（圖 5 偏下方）的關鍵詞詞組，顯示比較偏向意識形態建設的字詞（代表習近平本人、部分中央宣傳系統官僚組織使用詞彙），如：傳播、群眾、幹部、全黨、法治、黨性、唯物等。這類詞彙顯示習近平本人，或這類官僚組織提及「習近平外交思想」時，較重視強調冠名

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工作成果的重要性。就此，從關鍵詞詞組觀察，顯示官僚系統在陳述意識形態體系，字詞使用有不同重點，會帶入各自關切的主題。這種差異性關鍵詞詞組的運用，呼應我們在上一節字詞網絡圖、字詞頻率的討論。

表 2 官僚系統使用關鍵字在單一維度光譜的分布（取前 30 個）

左方光譜	中間部分	右方光譜
傳播、群眾、幹部、全黨、法治、唯物、涉外、學術、執政、黨員、村民、鄉村、人生、調查、學科、軍隊、腐敗、命脈、原理、紀律、文獻、經典、精準、路線、農家、黨性、先手、監察、巡視、不勝	發展、國際、世界、國家、人類、關係、人民、歷史、近平、經濟、重要、推動、大國、堅持、戰略、建設、文明、治理、維護、安全、問題、開放、領導、理念、提出、實現、不斷	主席、論壇、友好、總統、記者、元首、各方、表示、友誼、出席、項目、歡迎、中方、會晤、訪問、互信、舉行、高峰、協作、建交、認為、國事、峰會、升級、復甦、成員、期間、期待、簽署、鐵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論

中共意識形態的討論指出，意識形態完成後，官僚組織也會「再詮釋」陳述。但類似研究較少討論意識型態在涉及外交領域時，有關官僚組織是否會進行詮釋。領導人的冠名意識形態，是否又會影響外交政策陳述的差異。本研究以官僚組織在《人民日報》有關「習近平外交思想」的評論文章，檢視前述課題。我們認為冠名意識形態的「集體性」特徵，官僚組織融入組織關注的議題，並「詮釋」成符合其組織立場的陳述，這反映官僚組織的陳述慣性。分析結果顯示，三個官僚系統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型，空間分布確實有差異。從陳述的語言邏輯、關鍵詞頻率、常用的關鍵詞詞組等觀察，也呈現差異。分析甚至顯示，官僚系統與官僚在意識型態陳述，也和領導人本人陳述自己冠名意識形態時的立場有差異。模型分析甚至顯示，習近平本人在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工作的講話，立場可能是最極端的，多數時和其他官僚組織（與個人）差距最大。我們的分析呈現官僚組織確實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報刊評論，使用前述差異標示立場。這種官僚組織透過意識形態「包裝」其表達陳述的方式，也說明意識形態在中共外交領域的作用，仍符合一般

中共決策過程碎裂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分析，及過去探討冠名意識形態「書寫集體化」過程的典型見解。

從理論與實證角度，雖然諸多觀察指出，意識形態在中共外交領域的影響力日漸淡化。正如本文前言提及，這與 1980 年代中國適應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有關，務實外交陳述愈受重視（Brady, 2008; Chen, 2022; Chen and Hsu, 2018, 2021）。近期意識形態影響力的增強，雖可能反映國際政經格局的不穩，或由於國內總體經濟增長趨緩，使領導人藉冠名意識形態的「政績」，彰顯個人的外交作為。^⑤不過，我們分析顯示，官僚系統在陳述冠名意識形態時，傾向把各自「在意」的議題融入這些意識形態，如外交部偏好的關鍵詞組重視實際的外交成果，這和習近平個人使用的關鍵詞組，有很大的差距（見圖 5 與表 2）。這顯示官僚機構在陳述冠名意識形態，仍保有某些主動權，傾向表彰自我的工作成果。這顯示意識形態書寫的「碎裂威權主義」特徵，領導人與官僚都必須參與意識形態書寫與詮釋，他們也因此被制約，但他們各自尋求調適的策略，在這個「集體性產物」中，融入各自在意的部分。

就此，從政策現實角度，這些發現也許無法推論中國整體外交政策、或涉外官僚系統的對外行為。但前述發現證實官方意識形態框架，確實正逐漸侵蝕整體外交政策論述，領導人與官僚處理這類論述的微妙差異，或許提醒更應仔細觀察外交官僚的行為。我們證實了，習近平主政後的多位外交部會首長，包括楊潔篪、王毅、秦剛等人，立場不如想像中與習近平相近。這可能還說明習近平主政後，其主導的外交體制與政策改革，包括更強調領導人功績，及黨對外交體制控制等，內部始終有雜音。

值得注意的是，考量到習近平主政後冠名意識形態的「個人化」現象，我們研究顯示這種藉冠名意識形態達成個人集權舉措的方式，事實上是與政策過程「碎裂威權主義」的決策特徵並存的（吳玉山等人，2022；李英明，2017；Hu, 2019；Tsang and Cheung, 2024）。這種意識形態工程模式，更與毛澤東時期透過動員群眾，鞏固其在意識形態獨尊地位的模式有極大差異（Gao, 2019;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Perry, 2012）。^⑥就此，他終究無法使領導人擺脫官僚體系對其的束縛。

從方法角度，我們分析說明，應用自動摘要生成技術（Automated Text Summmerization）與空間點估計（ideal point estimation）的 Wordfish 泊松空間模

註⑤ 我們感謝一位審查人對此提出的觀點。

註⑥ 我們感謝一位審查人對比較性視角提出的建議。

型（Poisson Scaling Model），辨別官僚組織陳述冠名意識形態的過程是有效的。我們的研究呼應這類研究策略，能與中共意識形態議題對話的可能性（黃信豪，2023；邵軒磊，2019，2024）。此外，我們還推進報刊出版品文本資料這類研究議題的進展（寇健文、梁書瑗，2008；寇健文、鄭兆佑，2006）。本文在有關議題與方法，作出了初步探索。

（收件：112 年 6 月 12 日，接受：114 年 1 月 9 日）

Bureaucratic “Reinterpretation” of Leaders’ Ideologies: A Case Study of People’s Daily’s Commentary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Yi-nung Tsai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Yen-chieh Liao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Abstract

Ideolog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gime. Some studies revea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is not entirely monolithic, as seen through the official process of ideological formulation. After an ideology is established,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may engage in “reframing” its statement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seldom examines whether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rewrite ideological narratives when it pertains to foreign affairs or how the naming of a leader’s ideology influence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This paper takes the People’s Daily commentaries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s a case stud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the CCP’s “writing team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Our research approach involves marking the bureaucratic affiliations of commentary authors durin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zing the data using Automated Text Summarization and the *Wordfish* Poisson Scaling Model

for ideal point estim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ifferences in authors' bureaucratic affiliations correspond to variation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ir ideological stances. This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at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use ideological narratives to signal their positions, even within the realm of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Ideology, 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Ideal Point Estim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People's Daily

參考文獻

- 丁東（2005）。〈「文革」寫作組興衰錄〉。《文史博覽》，2005（19）：4-11。[Ding, Dong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riting Team. *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 2005 (19), 4-11.]
- 人民日報國際部（編）（2019）。《風從東方來：國際人士親歷中國改革開放》。人民日報出版社。[People's Daily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Ed.) (2019). *Feng cong dongfang lai: guoji renshi qinli zhongguo gaige kaifang*. People's Daily Publishing]
-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主編（2022）。《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五南。[Wu, Yu-shan, Kou, Chien-wen, and Wang, Hsin-hsien (Eds.) (2022). *A Person or an Era: Examination of the Xi Jinping Decade*. Wu-nan.]
- 吳冷西（1999）。《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Wu, Leng-xi (1999). *Shinian lunzhan: zhongsu guanxi huiyilu, 1956~1966*.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李英明（2003）。《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生智出版社。[Li, Ying-ming (2003). *Reading China: Power, Power and Ideology*. Shengzhi wenhua.]
- 李英明（2011）。〈中共意識形態論述變遷之話語分析〉。《展望與探索》，9（11），37-47。[Li, Ying-ming (2011).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Change in Communist China's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9 (11), 37-47.]
- 李英明（2017）。〈習近平思想：新的中共意識形態模式的興起〉。《展望與探索》，15（9），8-13。[Li, Ying-ming (2017). Xi Jinping Thought: The Rise of a New CCP Ideological Model,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15 (9), 8-13.]
- 周西（2010）。〈從梁效到鄭青原看官方寫作組的前世今生〉。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檢索日期2023年3月20日，取自<https://www.rfi.fr/cn/中國/20101115-從梁效到鄭青原看官方寫作組的前世今生>[Zhou, Xi (2010). *Cong liangxiao dao zheng qingyuan kan guanfang xiezuo zu de qianshi jinsheng*.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 邵軒磊（2019）。〈機器學「習」：以文字探勘法探索習近平時期之大外宣戰略〉。《中國大陸研究》，62（4），133-157。[Shao, Hsuan-lei (2019). Machine Learning: An Application of Text Mining to Xi'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Strate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2 (4), 133-157.]
- 邵軒磊（2024）。〈深度學「習」：以自然語言處理方法研究「習近平重要講話」意識形態與時序變化趨勢〉。《問題與研究》，63（3），79-108。[Shao, Hsuan-lei (2024). Learning "Xi":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mportant Ideology Model and

- Timeseries Trends in “Xi Jinping’s Speech”. *Issue and Studies*, 63 (3), 79-108.]
- 洪敬富、司昕山（2016）。〈習近平主政以來的中共黨國宣傳體系與意識形態工作：新瓶舊酒或新瓶新酒？〉。《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8，31-76。[Hung, Chin-fu, and Si, Xin-shan (2016).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under Xi Jinping’s Rule: New Bottle Old Wine or New Bottle New Win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48, 31-76.]
- 高華（2014）。《歷史筆記（II）》。牛津大學出版社。[Gao, Hua (2014). *Lishi biji*, Vol.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寇健文、梁書瑗（2008）。〈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政治科學論叢》，38，35-70。[Kou, Chien-wen, and Liang, Shu-yuan (2008). Power Transitions as Revealed from News Photos: Jiang Zemin’s and Hu Jintao’s Photos on the People’s Dail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35-70.]
- 寇健文、鄭兆佑（2006）。〈從黨報版面語言觀察中共高層菁英互動：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例〉。《政治學報》，42，37-78。[Kou, Chien-wen, and Cheng, Chao-yo (2006). Party Newspaper’s Layouts and Elite Interaction: People’s Daily and PLA Daily as Exampl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2, 37-78.]
- 張執中（2018）。〈黨國意識形態的權力與制度：習近平時期的觀察〉。《展望與探索》，16（4），71-88。[Chang, Chih-chung (2018). An Observation of Power and System of Party-State Ideology in Xi Era.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16 (4), 71-88.]
- 習近平（2018）。《論堅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Xi, Jin-ping (2018). *Lun jianchi jiangou renlei mingyun gongtong ti*.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連雋偉（2019）。〈陸黨媒評論，署名學問大〉。中時新聞網。檢索日期2023年3月20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1000100-260514?chdtv> [Lian, Juan-wei (2019). *Lu dangmei pinglun, shuming xuewen da*. China Times.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Chen, Yung-fa (2001). *Zhongguo gongchan geming qishi nian*. Linking Publishing.]
- 陳永發（2010）。〈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9，127-169。[Chen, Yung-fa (2010). Mao Zedong and the Seven-Thousand Cadres’ Conference: Developing Democracy or Foreshad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69, 127-169.]

- 陳璋津（1988）。《商品經濟與中共的社會主義道路》。蒲公英出版社。[Chen, Chang-chin. 1988. *Shangpin jingji yu zhonggong de shehui zhuyi daolu*. Pugongying Press.]
- 陳璋津（1995）。《中共的權力機制》。唐山出版社。[Chen, Chang-chin (1995). *Zhonggong de quanli jizhi*. Tonsan Press.]
- 黃信豪（2023）。〈民粹威權主義與習近平的民主話語：文字探勘方法的應用〉。《中國大陸研究》，66（1），1-45。[Hung, Hsin-Hao (2023).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and Xi Jinping's Discourse about Democracy: An Application of Text-Mining Methods.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6 (1), 1-45.]
- 新華網（2018）。〈習近平：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檢索日期2023年3月20日，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Xinhuanet (2018). *Xi Jinping: nuli kaichuang zhongguo tese daguo waijiao xin jumian*.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 新華網（202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檢索日期2024年12月16日，取自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Xinhuanet (2022). *Xi Jinping: gaoju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weida qizhi, wei quanmian jianshe shehui zhuyi xiandaihua guojia er tuanjie fendou—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 ershi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shang de baogao*. Retrieved December 16, 2024.]
- 新華網（2023）。〈習近平接見2023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並發表重要講話〉。檢索日期2024年12月16日，取自<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229/3d7b7cf2e1854d078fc526ef67589e08/c.html> [Xinhuanet (2023). *Xi Jinping jiejian 2023 niandu zhuwai shijie gongzuo huiyi yuhui shijie bing fabiao zhongyao jianghua*. Retrieved December 16, 2024.]
- 楊宗新（2021）。〈中共「外事辦」角色演進研析〉。《展望與探索》，9（11），115-126。[Yang, Chung-hsin (2021).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Evolution of CPC's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Affairs.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9 (11), 115-126.]
- 楊繼繩（2004）。《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Excellent Culture Press。[Yang, Ji-sheng (2014). *Zhongguo gaige niandai de zhengzhi douzhe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 賈世煜（2015）。〈揭秘：在《人民日報》刊文評點習近平論述摘編的「聞言」是誰〉。檢索日期2023年3月20日，取自<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49719414075.html> [Jia, Shi-yu (2015). *Jiemi: zai renmin ribao kanwen pingdian*

- xi jinping lunshu zhaibian de 'wenyan' shishei*.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 端傳媒 (2016)。〈「文革寫作組」漫遊指南〉。檢索日期2023年8月30日，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22-mainland-culturerevolution2/> [Initium Media
(2016). “Wenge xiezuo zu” manyou zhinan. Retrieved August 30, 2023.]
- 趙建民、張執中 (2005)。〈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 (2)，299-341。[Chao, Chien-min, and Chang, Chih-chung (2005).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a Leninist Political Party: The Case of the CCP.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7 (2), 299-341.]
- 鄭明達 (2020)。〈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在北京舉行〉。人民網。檢索日期2023年8月30日，取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0/c1001-31790645.html> [Zheng, Ming-da (2020). *Xi jinping waijiao sixiang yanjiu zhongxin chengli yishi zai Beijing juxing*.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August 30, 2023.]
- 鄭重 (2017)。《張春橋：1949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Zheng, Zhong (2017). *Zhang chunqiao: 1949 ji qiho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盧文炤 (2016)。〈理論文章如何越「走」越「寬廣」〉。人民網。檢索日期2023年8月30日，取自<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6/1220/c408973-28963964.html> [Zheng, Ming-da (2020). *Lilun wenzhang ruhe yue 'zou' yue 'kuanguang'*.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August 30, 2023.]
- 錢洪山 (2022)。〈深刻領悟習近平外交思想開創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新局面〉。人民網。檢索日期2023年8月30日，取自<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22/0824/c117092-32509982.html> [Qian, Hong-shan (2020). *Shenke lingwu xi jinping waijiao sixiang kaichuang xinshidai dang de duiwai gongzuo xin jumian*.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August 30, 2023.]
- 鍾延麟 (2013)。《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Chung, Yen-lin (2013). *Wenge qian de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de “fushuai”, 1956~196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鍾延麟 (2014)。〈彭真在1959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中國大陸研究》，57 (1)，97-125。[Chung, Yen-lin (2014). Peng Zhen'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of 1959.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7 (1), 97-125.]
- 鍾延麟 (2016)。〈彭真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中的角色和活動（1949～1966）〉。《中國大陸研究》，59 (2)，67-101。[Chung, Yen-lin (2016).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66).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9 (2), 67-101.]
- Armstrong, James. D. (1977). *Diplomacy, Revolutionary: Doctri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dy, Anne-Marie (2008).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 Brødsgaard, Kjeld Erik, and Chen, Gang (201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9: Organization, Ideology, and Prospect for Change*. Brill.
- Cabestan, Jean-Pierre (2021).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Xi Jinp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2), 319-336.
- Catalinac, Amy (2017). Positioning under Alternative Elector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Candidate Election Manifesto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2 (1), 31-48.
- Chen, Titus C. (2022). *The Making of a Neo-Propaganda State: China's Social Media under Xi Jinping*. Brill.
- Chen, Titus C., and Hsu, Chia-hao (2018). Double-Speaking Human Rights: Analyzing Human Rights Concep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89~20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534-553.
- Chen, Titus C., and Hsu, Chia-hao (2021). China's Human Rights Foreign Policy in the Xi Jinping Era: Normative Revisionism Shrouded in Discursive Moder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2), 228-247.
- Doshi, Rush (2021).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ckett, Jane (2019).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Policymaking in China: Network Authoritarianism from Jiang Zemin to Hu Jintao. *The China Quarterly*, 237, 15-37.
- Gao, Hua (2019). *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Gentzkow, Matthew, Kelly, Bryan, and Taddy, Matt (2019). Text as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7 (3), 535-574.
- Grimmer, Justin, and Stewart, Brandon M. (2013). Text as Data: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Political Texts. *Political Analysis*, 21 (3), 267-297.

- Hamrin, Carol Lee (1992).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pp. 96-12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 Weixing (2019).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5), 1-14.
- Imai, Kosuke, Lo, James, and Olmsted, Jonathan (2016). Fast Estimation of Ideal Points with Massive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0 (4), 631-656.
- Jones, Lee, and Hameiri, Shahar (2021). *Fractured China: How State Transformation Is Shaping China's Ri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mpton, David M. (2014).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aver, Michael, Benoit, Kenneth, and Garry, John (2003). Extracting Policy Positions from Political Texts Using Words as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2), 311-331.
- Liao, David Yen-chieh, and Tsai, Yi-nung (2024). *Factionalism and the Red Guards under Mao's China: Ideal Point Estimation Using Text Data*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 Lieberthal, Kenneth G. (1995).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W. Norton.
- Lieberthal, Kenneth G. 1992.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pp.1-3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thal, Kenneth G., and Lampton, David M. (1992).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we, Will (2008). Understanding Wordscores. *Political Analysis*, 16 (4), 356-371.
- Lowe, Will, and Benoit, Kenneth (2013). Validating Estimates of Latent Traits from Textual Data Using Human Judgment as a Benchmark. *Political Analysis*, 21 (3), 298-313.
- Lynch, Daniel C. (1999).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Schoenhals, Michael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isner, Maurice J.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ee Press.
- Mihalcea, Rada, and Tarau, Paul (2004). *TextRank: Bringing Order into Text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July 25-26,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Barcelona, Spain.
- Mokry, Sabine (2023). China's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Between Orchestration and Cacophony. *The Pacific Review*, 37 (2), 1-28.
- Nivre, Joakim et al. (2016). *Universal Dependencies v1: A Multilingual Treebank Collectio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LREC'16), May 23-28,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ELRA), Portorož, Slovenia.
- Nivre, Joakim et al. (2020). *Universal Dependencies v2: An Evergrowing Multilingual Treebank Collectio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Conference, May 11-16,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Marseille, France.
- Patapan, Haig, and Wang, Yi (2018). The Hidden Ruler: Wang Huning a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09), 47-60.
- Perry, Elizabeth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roksch, Sven Oliver, and Slapin, Jonathan B. (2010). Position Taking in European Parliament Speech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3), 587-611.
- Proksch, Sven-Oliver, and Slapin, Jonathan B. (2009). How to Avoid Pitfall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Texts: The Case of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18 (3), 323-344.
- Schoenhals, Michael (1992).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Fiv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ur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07).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57, 25-58.
- Shirk, Susan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lapin, Jonathan B, and Proksch, Sven Oliver (2008). A Scaling Model for Estimating Time-Series Party Positions from Tex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3), 705-722.
- Tsai, Wen-hsuan (2017).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4 (3-4), 203-213.
- Tsai, Wen-hsuan, and Dean, Nicola (2013).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The China Journal*, 69, 87-107.
- Tsai, Wen-hsuan, and Kao, Peng-hsiang (2013).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394-410.
- Tsai, Wen-hsuan, and Zhou, Wang (2019). Integrated Fragm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Leading Small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82, 1-22.
- Tsang, Steve and Cheung, Olivia (2024).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i Jinp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Guoguang (2015).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e, Wei (2023). Fragmented Soft Power: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a's Foreign Aid in Education to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 (142), 635-651.